

罪恶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于 1939 年 9 月 1 日。

在成立之前，我当“主席”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之上设有“蒙疆联合委员会”。而该“委员会”直接听命于日本陆军省“兴亚院”驻蒙分支机构“蒙疆联合部”和张家口日本军部。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在前，我又自恃投靠日本在先，日军进犯察、绥地区和西部盟旗时，又卖过力气，并有“蒙古军”和各盟、旗王公为后盾，在军政机关方面虽已采用日本顾问制，但我和蒙古职员尚有一定“权力”，所以有时我就撒娇卖乖地不受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指挥。就是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对于“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指示”，在执行上也不全都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军部为了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削弱“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的权力，加上这三个伪政权统治的地区毗连、关系密切，张家口的日本军部为了进一步控制产业、交通、金融等重要部门，加强殖民统治，搜刮战略物资，认为应该加以“合并”，在张家口建立统一机构，便于日本军部就近监督指挥。另外，日本和德、意结成“防共”轴心后，本以进攻苏联为目的，在制造张鼓峰和诺门罕两事件中，知道苏联力量的强大，于是由企图进攻改为防御。而“蒙疆”地区北部，正与蒙古人民共和国

毗连，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一地区划成“防共”的“特殊区域”，企图切断共产党的国际联系，特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以资集中力量，发挥“防共回廊”的作用。同时，通过“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这个御用工具，更可加强殖民统治，搜刮重要战略物资，建立兵站基地，作为再度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进攻苏联的跳板。

在三个伪政权合并问题上，我和日寇是有过主奴之争的：日寇主张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撤销“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合并，在张家口成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莲沼兵团司令官“任命”我为“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时，就是实现这个主张的先声。当时，我想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取消“蒙疆联合委员会”，吸收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在呼和浩特（厚和豪特）建立“蒙古自治国”。因此，我与日寇多次发生过主奴之间的争论（详见《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由于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失败，感到不能再和日本“合作”下去，一心打算出走，从此我在三个伪政权合并问题上，就不再和日本军部争执了。

1939年6月11日，我邀同“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的首脑于品卿、夏恭二人，依照金井章二之嘱，前往日本军部见面。莲沼兵团司令官，表示三个伪政权“愿意合并”。但我对“建国”问题仍不死心，还想趁合并机会谋求实现，密派我的秘书朝克巴达尔夫（陈国藩）和伪满“驻蒙代表”李义顺联络，取得通过伪满进入日本国内的证明，到东京和吴鹤龄进行建立“蒙古自治国”的活动。朝克巴达尔夫所带的草案是他和吉尔嘎朗（德古来）连夜拟具的。我主张要求建立“蒙古自治国”，吉尔嘎朗恐怕不易实现，主张要求建立“自治国”或“自治邦”，并嘱朝克巴达尔夫到东京后，请吴鹤龄斟酌实际情况进行。吴鹤龄也认为

应要求建立“蒙古自治邦”。他们向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处活动之后，适日本军部政治参谋大桥雄熊也返日，向陆军省请示三个伪政权的合并问题。吴鹤龄请大桥帮忙，大桥答复说：“我是代表军部为了要求建立蒙古自治国而来，偏遇你们又来要求建立自治邦，现在‘国’不能成了，‘邦’也不能成了，仅允许成立联合自治政府。这都是你们闹坏了，可别埋怨我们！”于是“建邦”、“建国”问题就又搁起来了。

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确实有过建立“蒙古自治国”的活动的准备，因为三个伪政权合并后，曾使用过印有“蒙疆联合自治国”而又抹掉“国”字改印“政府”二字的公文用纸和封套。根据这一点来看，才知道是有过建“国”的酝酿和筹备的。即从日寇对华政策来说，当时是采取分割统治的办法，事实上已在东北制造了“满洲国”，在华北制造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华南制造了“维新政府”，也许有过建立“蒙古联合自治国”的打算。为什么又中途变卦了呢？绝不会如大桥雄熊说的那样简单，可能出于两个企图而变更：一是由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声明，想用政治攻势诱降蒋介石媾和；二是这时汪精卫可能与日寇有了秘密活动，日寇为了政治诱降蒋介石或实现利用汪精卫分割统治中国的阴谋和策略，“蒙疆”也就不能成“国”，所以就变更了。

我派朝克巴达尔夫密赴日本，并向日本陆军省要求允许召开第四次“蒙古大会”，讨论三个伪政权合并问题。当时由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出面答复，表示同意，并向吴鹤龄说：“听说德王老和日本军部摩擦，他们（指日本军部）要杀他呢！希转告德王，今后不要再和日本军部摩擦，以防生命危险。”这不过是田中隆吉恫吓我，叫我俯首贴耳地作日本军部的忠顺傀儡而已。

朝克巴达尔夫返回后，我就草草召开了第四次“蒙古大会”，表示同意三个伪政权“合并”。至于建立什么样的“统一”伪政权，算作大会“授权”我这个“主席”全权办理。我在 9 月 1 日前赴张家口商洽“合并”问题时，已决心不再和日寇争执，金井章二提出来早已准备好的三个伪政权合并方案（如“政府组织大纲”、“施政纲领”、“旗帜”等），我连看也不看，就表示同意。他提名卓特巴札普当伪政务院长，我本来不怎么同意，口头上也说：“好！好！好！”表示甘心愿意饰演这幕傀儡剧的主要角色。

我虽然这样恭顺服从，日本军部仍恐我演不好这出傀儡戏，特于“蒙疆政府”成立前一天，由金井章二负责预作排演，把我和于品卿、夏恭召集在一起，说业由日本军部内定我为“主席”，于、夏为“副主席”。又说“合并”必须强调“基于民意”，明天就举行“推选式”和“合并典礼”，应当事前“演习演习”。于是金井章二指于品卿说：“你应当说，我代表察南 170 万民众推选德王为主席。”指夏恭说：“你应当说，我代表晋北 150 万民众推选德王为主席。”指我说：“你应当说，我代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区域内 300 万民众，推选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最后，又吩咐说：“这是在推选式上你们三位正、副主席应当讲的话。在举行政府成立典礼时，由夏副主席宣读政府成立宣言，由于副主席宣读政府组织大纲和施政纲领，并希德主席先讲话，说明合并的意义和经过。”于、夏当时应承了。我这时的心情，实在不愿意讲话，就表示推托之意，结果就由金井章二担当报告合并的意义和筹备经过这场戏的角色了。接着他又嘱咐一些话，甚至开会的一般常识，都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在这出傀儡戏中，金井章二真是很负责任的一位“导演”。

到了 9 月 1 日，仍由金井章二主持举行仪式，把我和于、夏二人请到“蒙疆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室，在日本军部田中信一

参谋长、大桥雄熊政治参谋等少数人参加下，举行推选式。进行的程序和会在会上的发言，一如前一天的预演，一言一行都没有变更，仅是增加照相这最后一幕。从此我就当上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于、夏二人就当上了副主席。接着举行“蒙疆政府”成立典礼。我和于、夏二人就以正、副主席身份出现，在莲沼兵团司令官、“来宾”、地方首脑和“蒙疆联合委员会”全体职员参加下，首由金井章二报告三个伪政权合并成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意义”和筹备经过，由于品卿宣读所谓“政府组织大纲”和“施政纲领”，由夏恭宣读所谓“政府成立宣言”，继由莲沼及“来宾”等致祝词。所有这些，也是按照事先排演的进行，没有什么变更。

“推选式”和“成立典礼”举行后，我就依照金井章二提出来的名单，任命卓特巴札普为伪政务院长和各伪部局长以上官员，及“察南”、“晋北”两个“政府长官”与巴、察、锡、乌、伊各盟盟长。接着就由伪政务院长卓特巴札普召开“政务院会议”，通过伪政务院、参议府和地方行政机构官制。确定张家口为“首都”，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规定统治区域，说明政府“旗帜”制定的意义。兹将蒙疆政府组织大纲等件摘录于下。

（一）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组织大纲：（1）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蒙疆地域为统治区域，团结东亚各民族；（2）新政权称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3）新政权首脑称为主席；（4）新政权以发扬东亚道义，尊重民意，为施政之大本；（5）首都设在张家口。

（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施政纲领：（1）宣扬东亚道义精神，并期其实现；（2）大同协和诸民族，大施经论；（3）振兴民生，确保安宁，保障人民幸福；（4）从共产主义“毒

害”中解放诸民族，以资强化“防共”战线；（5）团结友邦，同志相契，以奠定东亚新秩序。

（三）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旗帜：向来蒙疆各政权各自有代表旗帜，现在伴随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诞生，应有代表整个区域统一政权的表征。因此，特制定从上而下横条黄、蓝、白、赤四色七条的政府旗帜。黄色象征汉族，蓝色象征蒙族，白色象征回族，中间赤色象征日本。就是以日本为中心，大同协和汉、蒙、回各族，作为代表政府的表征。

（四）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领域：规定依据从来的“蒙疆”的区域为领域，确定地方行政机构为两个政府、五个盟，其中察南政府管辖原属十县和张家口一市；晋北政府管辖原属十二县和大同一市，巴彥塔拉盟管辖原属十一县、五旗和“厚和”、包头二市；察哈尔盟管辖原属八旗、八县；锡林郭勒盟管辖原属十旗；乌兰察布盟管辖原属六旗和固阳一县；伊克昭盟管辖原属七旗和五原、临河、东胜、沃野四县（实际当时伊盟政权的政令仅能达到黄河以北，乌加河以东的准格尔、达拉特二旗部分地区）。

（五）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宣言：维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四年九月一日，合并蒙古、察南、晋北三治，肇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转移运会，秉济时艰，开大同大顺之宏图，莫长治久安之丕基。为此，特昭示境内各族民众，敬告东西邻邦及世界各国：我蒙疆地域乃历史上著名之故疆，民风朴素，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安于农耕牧业久矣。况且地势挟天险而兼大陆，幅员依长城而跨北海，惟自民国成立以来，军阀割据，残民以逞，凌虐百端，民不堪命，二十年来，委诸虎狼，徒供饲饵而已。

蒋也何人，不择手段，伪定一时，开府南京，以联苏容

共为国是，以割据抗日为至计，开罪友邦。进行抗日以来，连遭败北，仅保残喘于岷峨之间。而彼虎狼乘此空隙，时欲吞噬瀚海百旗之野，咆哮跳跃，薄我门墙，窥我堂奥，赤化之祸，行将临头。

我蒙古、察南、晋北三治，夙具同戚同休之心，誓图防共安民之治，必须标本兼治，通力合作，因而肇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期防止共产，协和民族。爰承友邦日本之提携，密切联系日、蒙、满、华达成巩固之一环，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发扬东亚道义之精神，光被世界，增进人类之福祉，功垂金帛。特将政府组织法及其他重要法案公布，通告各族，昭示内外，莫不咸庆是赖，并希东西邻友及世界各国，幸垂鉴察。天日在上，其共鉴之。

伪蒙疆自治政府组织和主要人事安排

依照伪蒙疆自治政府组织法规定，主席是最高首脑，由我担任，和我并列的是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其下是于品卿、夏恭两副主席。主席的办事机构是秘书处，由村谷彦治郎任处长。在主席、最高顾问领导下，设有管理政务的伪政务院，由卓特巴札普任院长。与伪政务院平行的机构，有管理军事的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由李守信任总司令，还有咨询建议性质的伪参议府，由李守信兼任议长，聘任杨桑为名誉议长，特任吴鹤龄为参议，由村谷延治郎兼任伪参议府秘书处处长。伪政务院设有总务、民政、治安、司法、财政、产业、交通七部和一个牧业总局。总务部长关口保；民财部长松律旺楚克、次长大场晨之助；治安部长丁其昌；司法部长陶克陶，次长波多野义雄；财政部长马永魁、次长日比野襄；产业部长杜运宇；交通部长金永昌、次长伊藤祐；牧

业总局长郭尔卓尔札布、次长泉名英，后为柏五郎。由伪院长和各部、局长组织政务院会议，讨论决定有关重要政务事项。实际上，任何事必先经日系伪总务部长和各部、局日系次长的研究决定后，才能提到政务院会议上。对于提出的事项，只能通过，不能否决。至于我这个“主席”的权力，仅是公布法令、教令、教书、大赦、特赦、授勋等，虽然还有“主席统率军队”的规定，实际上是无权过问，真是高高在上的傀儡。至于两个“副主席”更是无事可干。伪政务院还设置了两个咨议，一个是特克希卜彦（王宗洛），一个是雄诺敦都布。因为他两人曾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部长，合并后没有适当的位置，只好给予咨询名义，置诸闲散。

直属伪政务院的机构有“蒙疆学院”，由伪总务部长关口保兼任院长，副院长是日本人田边寿利，专司训练培养效忠日本的中下级职员。有“驻外代表部”和“办事处”，“驻满代表”是恩和布林（吴恩和），后为李丹山；“驻日代表部”的代表是日本人，后为特克希卜彦。驻北京的“外交机构”是办事处，处长是日本人。还有地政局、审计局，局长都是日本人。至于各伪部、局机构的情况是：民政部管辖的直属机构有蒙古学院，院长仍由金永昌兼任；蒙古文化馆，馆长仍是伊德钦；治安部管辖的直属机构有中央警察学校，校长是日本人早根务男。司法部的直属机构有各地法院和检察厅及各地监狱；财政部直辖的机构有蒙疆银行，总裁是萨音巴雅尔（包悦卿），继为巴萨尔，后为寺崎英雄；经济监视署，署长先是巴彦泰，后为于兰泽；税务监督署，署长开始是日本人，后为霍克济呼（霍翰甫）；产业部直属的机构有专管鸦片、盐业的清查榷运总署，署长是吉尔嘎朗。至于大同炭矿、电业、铁道、交通、畜产、食品等名目繁多的会社或公司，有的是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有的是日“蒙”合资经营，理事长

多由日本人担任。少数会社的理事长是由蒙人或汉人担任，也是管不了事的，大权都操在日系副理事长的手中。

伪司法机关分为三级，设在中央的有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厅。在“蒙疆政府”成立时，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厅长还未发表，我乘机向金井章二说：“补英达赖是蒙古的元老，现任巴彦塔拉盟盟长，仅是简任级，应当给他一个特任官。”金井说：“现在特任官的缺都没有了，仅有最高法院院长一缺，可以发表他。”我说：“补现任盟长是行政官，按制度上说不能兼任司法官呀。”金井说：“我想个变通办法发表就是了。”果然为时不久，金井特把法院官制中关于行政官不能兼任司法官的规定修改，提到政务院通过后，发表补英达赖为伪最高法院院长。伪最高检察厅长开始是刘继广，后为金永昌。伪巴盟高等法院院长是卓里克图（关荫南），伪巴盟高等检察厅长是那苏图（王庆三）。伪“厚和”地方法院院长是李介庵，伪“厚和”地方检察厅长由那苏图兼任。其他各地伪法院院长和检察厅长的姓名都不记得了。

伪地方行政机构主要人员是：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次长竹内元平；晋北政厅长官田汝弼，次长前岛升；巴盟盟长补英达赖兼，副盟长亢仁（默尔根巴图尔），参与官泽井铁马；察盟盟长由卓特巴札普兼，副盟长特穆尔博罗特，参与官筒牛耕三郎；锡盟盟长是林沁旺都特，后由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津旺楚克兼任，副盟长是补达巴拉，参与官中村浅吉；乌盟盟长初为巴宝多尔济，后为林庆僧格，参与官是山本信亲；伊盟盟长阿拉坦鄂其尔，参与官黑泽隆世；至于各伪县、旗长的安排，仍是采取蒙汉分治政策，旗札萨克或总管一律是蒙古人，县、市长是汉人或回民。人数很多，不再列举。

我和蒋介石的秘密联系

前面说过，我曾与日寇发生过主奴之争，特别是在“蒙疆联合委员会”问题上的争执以后，我就有了出走的打算。这时，日本驻在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酒井隆，因我的态度突然消沉，也引起他的怀疑和注意，我就更不能不谋早日出走了。但是，走向何方呢？反复思考，既不愿走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更不愿投向中国共产党，想来想去，还是认为以投靠蒋介石为宜。因为我知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承认蒙古封建制度的存在，还掌握着大量的军队，有统治中国的力量。更认为我和蒋介石还有过一段政治关系，总觉得他还赏识我。总之，是反动的封建阶级本质支配着我要重走这条路。出走的方向决定了，又考虑采取哪条路走向重庆。我计划从我旗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一夜间就可以到达，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认为这样走比较稳妥。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了，就寻找线索进行联络。忽然想起伪“厚和”市警察局长那木尔（刘建华）曾向我说过，蒋介石派来工作人员，劝我与其联络。因为当时日本人还敷衍我，使我过得去，我就对刘建华严词拒绝，表示绝不搞这一套，以免惹起麻烦和危险。以后刘建华也再未和我提及此事。这时我既然决定出走，觉得刘建华是联络引线。恰巧此时，迪力瓦由张家口要去“厚和”，我就嘱咐他秘密告知刘建华找寻蒋介石派来的工作人员，我不日前往“厚和”与之相见。接着我以视察巴盟为名前往“厚和”，刘建华见我说，有蒋介石派来的高荣少将，现在萨县工作，已经取得联络，近日即来此地。我当即密嘱刘建华，一俟高荣到后，在新城建设厅巷我的官邸相见。俟刘建华陪同高荣见我时，我把打算出

走的方向和计划告诉高荣，希望我到达苏、蒙时，重庆能照会苏、蒙准许我通过，转赴重庆。高荣当即答复我说：“这个事情很重要，需要我亲自去重庆请示蒋委员长。”我问他：“什么时候能答复我？”高荣说：“往返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他走后，刘建华向我报告说：“高荣见您后，认为得到意外收获，现已返重庆进行联络去了。”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还不见消息，使我甚为焦急，正打算找刘建华问讯时，刘建华特到张家口报告我说：“好险哪，听说高荣返经平津，几乎被捕。但是还好，高荣逃脱了，我们的事情还不至于败露。”嗣后高荣再也未来见我，这一段秘密联络，就暂告中止了。

高荣虽然杳无踪影，联络一时中断，但驻在陕坝的军统负责人员马汉三（当时化名马龙文）潜来“厚和”活动。这时和军统发生关系的有伪巴彦塔拉盟公署官房主任贺云章、科长梁芝祥、托克托县长肖兆庚、蒙古军总司令部副官处科长吴君玉等。但做我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是梁芝祥。约在 1939 年末，我因事到“厚和”，梁芝祥送来重庆方面给我打来的机密电报，我记得原文大意如次：“佛召（是我的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报尾署名是贺耀组。我嘱咐梁芝祥说：“这是极为秘密而且是关系重要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梁芝祥很郑重地对我说：“请主席放心，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泄露。”我返回张家口不久，梁芝祥又来见我，带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派我为蒙古自治委员会主席兼第八路军总司令，派李守信为热河省主席兼第十路军总司令的任命状。并对我说：“李守信的任命状是李叫我带给主席看的。为了避免检查起见，特由吴君玉穿着军装带到张家口交我的。”我当即把委任状收下，认为可以作为我出走通过外蒙和苏联的凭证。我问梁芝祥：“厚和

还有蒋介石派来的工作人员吗？”他答说：“还有一个马龙文。”我当即嘱咐梁芝祥速返“厚和”，通知马龙文密来张家口与我见面。为了避免发生差错，梁芝祥当场将他的名片取出一张，分为两半，一半交给我，一半由他带回交给马龙文，备作前来见我时的暗号和凭证。不久，马汉三即密来张家口，由赛吉尔胡领来见我。我看暗号凭证相符，就出而相见。我说：“前次我和高荣联络，提出取道北路通过外蒙、苏联，转赴重庆；嗣由梁芝祥给我转来复电，叫我取道包头这条路前往。经我详细考虑，认为这条路赴渝，很不妥当。因为这条路必须经过包头，渡过黄河，日本军警岗哨很多，并且我是主席，举止行动，惹人注意，很容易被日本方面察觉。请你把我的意见转达蒋委员长，仍准取道北路赴渝，并请蒋委员长照会苏、蒙，对我不要留难。”马汉三答应转告请示。并说军统在张家口的联络和掩护机关是私立华北医院，今后来往密电或文件，均由该院转递。又说：蒋委员长打听吴鹤龄在这里做何工作？我即指定旺尔克札布秘书负责联络，并编好电报密码交给他使用。马汉三走后不久，即由华北医院给我转来复电，大意如次：“德总司令（因为这时蒋介石已任命我为第八路军总司令），取道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因为诺门罕事件业已和平解决，日苏关系已趋和缓，台端如果取道北路南来，通过苏联时，有被日本引渡过去的危险，仍宜另寻别途南来。如果无道路可寻，毋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报尾署名仍是贺耀组。我接到这个电报后，认为还有和马汉三面谈的必要，就叫旺尔克札布通过华北医院把马汉三找来。我和他说：“现在我已接到复电，知道蒋委员长不叫我取道北路赴渝，是对我深切的关怀，我至为感谢。今后只有按照蒋委员长的指示办理。并请你再次转请蒋委员长，准许在伊克昭盟也成立一个‘蒙古自治政府’。这样一来，那边的自治政府和这边的联合自治

政府便形成对立的局面，日本方面为了避免那边的争取，可能放松对我的控制，我就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训练军民，以待将来’的工作。”马汉三说：“我一定把你这个意见转报蒋委员长考虑。”

1940年春，日本军部调遣“蒙古军”各师开赴五原，第八师师长札青札布及第九师二十五团团团长郭景春路过张家口时，曾来见我，乌古廷亦在座。札青札布向乌古廷说：“这次调遣蒙古军各师到五原作战，是帮助王英的绥西联军打天下，将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我们蒙古军是为谁而死呢！”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五原将有战争发生，又引起我借机出走的念头，于是又叫旺尔克札布把马汉三找来面谈。我对马说：“听说傅作义正在五原布置军事，这边日本军部也正在调动兵力迫近五原，战争行将爆发。请你和傅作义联络，把五原作战暂缓一步，我趁此机会以慰问前方军队为名，亲赴前线，找个空隙溜走，你看怎样？”马汉三答应立即同傅联络。可是，他走后，五原战争就发生了，我这个出走计划又成了泡影。

我通过军统和蒋介石进行秘密联络，除了梁芝祥、旺尔克札布外，就是我最亲信人员赛吉尔胡、朝克巴达尔夫、超苦拔都尔也不详细知道，甚至对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也未告知，仅把蒋介石给我的任命状带回我旗，交由我妻妥为保存。并计划出走时，才临时通知陈绍武、丁我愚、都嘎尔苏隆等跟着我走。就是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二人，也仅负传递电报文件及进行联络之责，所有来往密电都由我亲自翻译，绝不假手他人。我和马汉三见面谈话时，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丁我愚等都不在场，把马汉三领进我的官邸，他们就躲开了。我认为进行得极为秘密，万无一失，但是这个事情终于败露了。

1940年春天，李守信前来张家口对我说：“坏咧！坏咧！日

本军警在‘厚和’搜查‘通敌’事件已经三天了。我们的事，可能都暴露了，你还不知道吗？”他这样一说，我也断定必然败露，但这个事情究竟怎样败露的，日本方面怎样发觉的，我是不知道其中的底细的。据我推断，可能在刘建华身上引起的。因为在五原战役中，日本军打了败仗，据说，策划这次战役的桑原特务机关长，在战场上自杀了。指挥这次战役的日本军部，为了泄愤和推卸责任，就在“厚和”、包头一带大肆搜查寻找“通敌”线索，偷听“通敌电台”，驻在“厚和”的日本宪兵队长去找“厚和”市的警察局长刘建华，质问他：“你曾推荐一个人（忘其名）在土默特旗工作，现在发现这个人‘军统’分子，有‘通敌’的事情，但是这个人逃跑了。这个人既然是你推荐的，你可能知道逃往何处，希你提供线索，以便进行逮捕归案法办。”刘建华是个狡黠的人，听了这话之后，马上答复说：“这还得了，我仅给这个人介绍工作，哪知人心叵测，竟敢干出‘通敌’这样重大的事情，真使我大吃一惊！我们警宪是一体，搜捕‘通敌’要犯，我与你有共同的责任。我一定用尽方法找寻这个人，找到以后，交你处理。”日本宪兵队长信以为真，当又嘱令从速寻找归案就走了。刘建华恐怕这事大败露后，株连到他的头上，就与吴君玉同到包头，乘坐“蒙古军”的汽车混出城门岗哨，渡过黄河，经过后套陕坝，投向重庆。日本人发觉刘建华逃脱，追查到了吴君玉身上，在吴家中搜查出密藏的小型发报机和参加军统的名单，接着把贺云章、梁芝祥、肖兆庚等也逮捕下狱，供出我和李守信通过军统与蒋介石的勾结关系。这时马汉三正在张家口，但是不知他住在何处，无法通知他。李守信就故意放出风声说：“军统案件败露了。”马汉三听到这个消息，即从张家口逃脱。

我和李守信知道事已败露，认为与其坐待日本军警追查，莫如亲往日本军部自首承认。这样商量之后，李守信即去日本军部

一趟，他回来时对我说：“我已经和岗部司令官说了，你也去说了吧。”我即偕同朝克巴达尔夫赴日本军部对田中信一参谋长说：“我今天来是对你谈谈我和蒋介石联络的一段经过，大概这个事情你也知道了吧。”田中信一说：“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我考虑一下认为还从大的方面说较好，便答复他说：“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对取道外蒙、苏联南下一节，避而未谈。田中信一进一步追问我说：“蒋介石如许可蒙古独立你怎么办呢？”这使我颇为窘迫，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才好。正在筹思之际，朝克巴达尔夫在翻译时，看出我的窘态，即用蒙语向我提醒一下。我当即领会他的意思，便答复田中信一说：“蒋介石即便许可蒙古独立，我也不能凭信一句空话，就冒然从事。因为我知道蒋介石说话一向是不兑现的。要看看实际上能否实现，才能解决我的行止。”不意我的这番话正与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据梁芝祥获释后对我说：他在宪兵队供称是蒋介石派人潜来策动我去重庆，我没有去。关于取道外蒙苏联一节，他因不知，也未供出。因为我的说法和梁芝祥的供词相符，田中信一便转怒为笑说：“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也全部知道了。蒋介石叫你走，你没有走，这就好。希望你不要为此担心，我对你完全谅解。”我这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心境平稳下来，便又向他请求说：“对于其他人员的处理，能够使我知道才好。”田中信一说：“可以。”过了几天，田中信一邀我到日本军部，他拿出一个准备判刑的名单来。记得上面有梁芝祥、肖兆庚、贺云章，还有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察南政府”的财政厅长）等，拟一律处死。我又请求说：“这件事情应由我全部负责，其他人员均是从犯。既然

对我谅解，希望也宽恕他们。”田中信一说：“既然你这样说，对于其中的蒙古人，可以从宽处理。”我就提出贺云章、梁芝祥是蒙古人，肖兆庚虽不是蒙古人，但在蒙古工作多年，也等于蒙古人了。田中信一说：“这几个人究竟如何处理，俟和有关部门研究后，再告知你吧。”不几日他又亲到我的官邸，仍拿出那个判刑的名单，对我说：“贺云章业已病死（据×××从日本宪兵队翻译探听，说是被用凉水灌死的），梁芝祥、肖兆庚二名从宽发落，各判徒刑八年，其他人员仍处死刑。”我认为再提出要求也是无用，因此我就未再谈什么。日本军部就把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等按“通敌抗日”罪名执行枪决了。这年五月间，我想回旗安排一下，但又恐日本方面阻拦，就故意向村谷彦治郎（“蒙疆”主席府秘书处处长）说我要回旗，试探他的口气。他如表示阻拦，我就不去，以免惹起日本方面的怀疑和阻拦。但试探结果，村谷并未表示阻拦，反为我准备车辆。我一看日本方面没有阻拦动向，就返回我旗，把蒋介石给我的任命状烧了。

这个案件处理以后，“蒙古军”总司令部顾问潘井少佐，曾向第九师师长包海明说，他曾参加过讨论处理这个案件的会议。田中信一参谋长主张对我和李守信不究，大桥雄熊政务参谋主张严办，经田中参谋长说明不究的理由是因为我俩是蒙疆的军政首脑，如果深究下去恐牵涉面广，影响太大。大桥还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及外蒙联络，那可不是玩的，一定要从严处理。”包海明把潘井少佐这番话告知吉尔嘎朗，吉尔嘎朗又转告我。这可能是日本军部有意识地授意潘井通过包海明转告我，无非是希望我死心塌地的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而已。另一方面是警告我不要和苏联、外蒙古联络。其实，这是日本军部的过虑，我当时只愿和蒋介石联络，绝不愿走外蒙古、苏联这条路。后来我为什么又去蒙古人民共和

国？是因为走投无路被迫而去的。记得我曾和吉尔嘎朗谈述过这一段的经过，并表示对蒋介石感激心情。吉尔嘎朗说：“据我看蒋介石不叫你取道北路赴渝，不是对你的关怀，而是怕你和外蒙联络起来，给他增加麻烦，所以特用‘恐怕被日本引渡过去’这句话来吓唬你。”吉尔嘎朗和我说的这番私房话，是很有道理的，蒋介石在电报中叫我留在原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是期待我借用日本势力，组织蒙古武装，当时作为“防共之用”，将来用以“反共”，是想实现他不可告人的阴谋。可是我在日本投降之后，就离开军队去北平，假如日本投降时我掌握着军队，一定会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进行反共反人民勾当的。这个反动企图，当时虽未如愿以偿，待到 1949 年春，人民解放军已打到浦口，国民党反动集团迁到广州，我还趁此机会，企图东山再起，暗与美帝国主义勾结，收集残部，在阿拉善旗定远营拼凑起来一个“蒙古自治政府”，企图组织武装力量，再与人民为敌。但为时不久，宁夏便告解放，我和李守信率同残部逃至阿拉善旗西北部，因为缺乏给养，军队四出抢掠，牧民逃避一空，陷入几百里地无人烟的境地。我在重重罪恶之上又加上了纵兵殃民的罪恶。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时期的“外交”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的“对外关系”，首先是与汪精卫伪政权的关系问题以及我的第二次“访日”和第三次访“满”，还有一些伪政权的对日和别的所谓“驻外”活动。

1938 年 12 月 18 日汪精卫和其党羽陈公博等逃出重庆，先到越南河内再派人去香港发出通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关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对华政治诱降声明。继即到达上海与日寇“讲和”，缔结卖国协定，并于 1940 年 3 月 30

日实行所谓“还都南京”，标榜中国领域内“分治合作”，“反共和平建国”，参与“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也声明今后对华政策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承认汪精卫伪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同时将以梁鸿志为首的伪南京维新政府随之撤销；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降为特殊的地方政权；关于“蒙疆”政权问题，日汪之间不能没有默契。汪精卫为了扩大他的权力，妄想作统治全国的首领，当然不愿蒙古独立，只承认“蒙疆高度自治”，日寇也不得不暂时迁就汪精卫的意见。

为了确定“蒙疆政权”和“汪精卫政权”的关系问题，“蒙疆”方面派出代表李守信偕同伪总务部长关口保、翻译陈有声等，汪精卫派出代表周佛海，在青岛缔结协定，并履行签字手续。这项协定的要点如次：1.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根据近卫首相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承认“新中央政府”（指汪伪政权）是继承中国法统的“正统政府”。认为重庆政权无论在法理上、实质上已降为地方政权。2. “中央政府”承认“蒙疆”是日、满、汉、蒙各族强度结合的地方政权。鉴于历史的、国防的、经济的重要性，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全盘施政既成事实的基础上，承认“蒙疆”高度自治。

李守信返张后向我详细汇报了他在青岛签字和与汪精卫会见时的情况。他说：签字仪式是在青岛一个宽阔的大厅举行的。当时日本华南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汪精卫都在青岛，却没有参加签字仪式，是由他和周佛海代表双方签字的。签字以前也未进行谈判，签完协定之后，又签订了一个附件。这个附件载明的事项主要有三点：1. “新中央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沿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2. “新中央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四色七条政权旗帜；3. “新中央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

治政府”在长城各口的驻兵权。签字之后，汪精卫、李守信参加宴会，并限定他一人代表“蒙疆”参加，计参加宴会者还有王克敏、梁鸿志、周佛海等。宴会间只是闲谈漫话，毫未涉及政治问题。

宴会后，汪精卫又邀李守信单独会见。李守信和板垣住在一起，他就和板垣商量说：“汪精卫单独请我谈话，是要谈什么话呢？谈政治我不懂，谈军事我倒知道一些，并且见面时怎么称呼呢？他如叫我李守信，我就叫他汪精卫，还是称他为汪主席呢？如果称他主席，他是谁的主席呢？”板垣说：“管他是谁的主席，就称他主席吧。”于是李守信同他的随从副官郝贵堂去见汪精卫。见面时，郝贵堂要照相，汪精卫说：“这个人进来行吗？”李守信说：“他是我的随从副官，靠得住。”照完了相，汪开始谈话说：“李总司令，你辛苦了。”李守信说：“汪主席，你也辛苦了。”汪说：“彼此都一样，没有什么。”李又说：“早没见面，久仰大名。你可说是不避危险诋毁，一生为国家大事奋斗。”汪说：“实在抱歉得很，我很愧对全国父老。”接着，汪问：“你的防地安静不安静？”李说：“傅作义前年反攻厚和，去年袭击包头，都被我们蒙古军配合日军打退。”汪又问李：“你的部队有无困难，你可以向我说，咱们研究一下，我好替你解决。”李答：“咱们亲日，不能叫兵们跟着受罪，没吃的向他们要，没花的也向他们要。蒙古军的补给很好，武器装备也不太差。”汪见李不向他求援，就又问：“听说满人和蒙人之间有摩擦，有这个事吗？”李说：“满洲人是蒙古人的外甥，你知道不知道？”汪说：“我知道。”李接着又对汪说：“蒙疆有多少满洲人，恐怕你不明白。蒙疆的满人都住在厚和市的新城，现在剩下不到 1000 户，就产生了一个满洲人市长李春秀。我们那儿也照顾少数，讲究民族协和，因为汉、满、蒙、回、藏各族，都是中国人，没有摩擦那回事。”汪一听，再

不吭声。待了一阵，汪又问李守信部队有无困难？李再次拒绝说：“主席老问我有无困难，可见对我们蒙古非常关怀。我们的困难，可以就地解决，不愿给主席多添麻烦。”汪见李始终不向他张口求援，便扯了一阵询问关于我的生活起居的闲话，即由周佛海、褚民谊和梅思平等陪同吃午饭，饭后李守信即告辞离去。

这个协定原稿，金井章二曾给我看过。我不但不同意这个协定内容，根本就不愿和汪精卫伪政权打交道。因为当时我认为：

1. 如果和他缔结这样的协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汪精卫政权和“蒙疆”政权是隶属关系，仅是互相承认、互相支持的关系，但在协定里却指出，“汪精卫政权”与“蒙疆政权”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就意味着“蒙疆”是汪精卫伪政府统治下的高度自治区域，与我一向谋求“蒙古建国”、脱离中国而独立的主张相反。

尤其使我不满的是，汪精卫已经承认了“满洲国”，却不承认蒙古的“独立”。因此，我主张对汪精卫政权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不愿缔结这样的协定。

2. 当时我还认为我之所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是基于“民族立场”与日本合作，用“为民族复兴”这块遮羞布来掩饰自己的丑恶。可另一方面，我却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在国民党中央曾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居然脱离抗战后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厚颜无耻，实在有点看不起他。

3. 当时我还认为：我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先，汪精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后，他却要后来居上，当我的顶头上司，把“蒙疆”地区划在他的统辖范围内，真使我有点不服气。不过我这时正与蒋介石秘密勾结，一心打算出走，因而对协定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汪精卫伪政权举行所谓“还都典礼”时，金井章二提出派伪政务院长卓特巴札普代表前往致贺，我也表示同意。

1940年春天，汪精卫以伪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偕同他的宣传部长林柏生等乘坐飞机前来张家口视察访问。前一天，金井章

二对我说：“明天汪精卫主席来张，主席（指我）应到飞机场迎接并设宴招待，当然也要谈些话，希从早做好准备。”我为遥向蒋介石买好起见，推说有病，明天不能到飞机场欢迎。金井章二知道我的牛脾气又上来了，就讪讪地对我说：“既然有病，应当请医生看看，注意休养。”说完就走了。金井章二走后不久，日本军部就派军医官前来给我看病，我也谢绝了。推说我的病适宜服中药，不宜服西药。翌日汪精卫等一行果然乘飞机来张，我仍称病未去欢迎，仅由卓特巴札普代表我到机场迎接。汪精卫来张视察是事先得到日本军部同意的。我称病不见，既给汪精卫以难堪，更使日本军部下不来台。汪精卫却向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等表示说：“既然德王有病，我去看看他。”大桥雄熊政治参谋当即给我秘书朝克巴达尔夫来电话，要我勉支病体，出而相见。我仍坚持不见。这可把大桥激怒了，当即用电话对朝克巴达尔夫说：“现在汪主席就去看德主席，切望务要出面相见。如果仍然拒见，我们日本军部要用全副的武装力量把汪主席护送到德主席的床前。”这个电话说完之后，大桥雄熊就陪同汪精卫前来我的官邸，我只好勉强出迎至大门口与汪相见，让至客厅座谈。大桥雄熊坐在一边监视着，汪开始慰问我的疾病，嘱要诊治休养。继则说：“蒙古过去是我们的同胞，现在也是我们的同胞，将来还是我们的同胞。应当加强团结合作，共同致力‘反共和建国’。”我也淡淡地回答数语，相谈不到 20 分钟，汪即辞去，由金井章二、卓特巴札普等陪同在远来庄宴会。当日下午即乘飞机返平转宁，我未去欢送。在飞机场汪还发表谈话说：“我这次来张，承军政各界亲切招待，表示感谢。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还亲往慰问德王的病情，看到他满面红光，一望而知是病情好转。”暗示讥讽我称病未去迎接之意。

不久，吴鹤龄由日本回来，我和他谈到拒汪的经过。他说：

汪精卫真是个大混蛋，全国军民都在抗战，他却前来投日。他之投日与我们不同，我们是基于“民族立场”与日本“合作”，他之投日是破坏全国抗战。并且我们与日本合作在先，汪之投日在后，现在又叫汪精卫来管辖我们，这等于叫我们随娘改嫁。吴同我一样，他这一套话，也是诵的同一套汉奸经。伪满“驻蒙代表”李义顺有一次和我说：“德主席拒见汪精卫的消息，香港报纸亦有登载，标题是‘德王拒见，汪逆碰壁’。”我当时听了还很得意呢。嗣后，听说汪精卫伪政府还颁布“蒙古自治法”，下达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本人也未拿来给我看。大概这个“蒙古自治法”可能是触犯了日寇直接控制“蒙疆”的权利，所以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关于我的第二次访日。这次“访日”是为了参加祝贺日本天皇纪元 2600 周年纪念典礼，报告“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后的“蒙疆政情”及恳请今后的“援助”。陪同我的有金井章二、李守信和随员等 20 余人。1941 年 2 月 11 日由张家口出发经过北平、山海关、汉城等地，2 月 25 日到达东京。日本松岗洋右外相及其他军政首脑人员到车站欢迎。日本外务省次官大桥忠一负责招待，与我接触机会较多，他在口头上表示尊重我的“权力”，因而我对他有良好印象。我在日本东京的活动，无非是访问军政首脑，游览名胜，参观学校、工厂，到处受到日本各界的招待，可以说，对我是极尽笼络之能事。当我见到日本天皇裕仁时，他很尊重地接见我，在致辞中希望我致力“东亚和平事业”。我在答辞中表示“感谢日本的支援”。但因见日本天皇时，我是身着蒙古长袍、坎肩便装，听说有的日本人背地议论我未穿马褂，不够隆重。当我参加日本外相招待宴会时，松岗洋右没有照例在宴前致辞，仅举杯说了“祝蒙古万岁”一句话。我在“访问”期间主要的活动，是与吴鹤龄前往陆军省面见陆相东条

英机、军务局长武藤章、兵务局长田中隆吉（都是旧相识）。我和吴鹤龄当时提出改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内容是：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下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蒙古联盟政务委员会”，专管巴、察、锡、乌、伊等五盟事务，这是为了恢复类似“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机构，我好从中掌握，作为我的政治资本。一个是“蒙疆自治委员会”，专管“察南”、“晋北”两个伪政府的事务。这是因为察南、晋北两个地区日本人抓得更紧，我什么事也不能过问，干脆放弃不管。这个方案提出之后，并抄录一份面交近卫首相，他们当时没有明确答复。田中隆吉当着我和吴鹤龄的面说：“吴先生很能干，叫他当政务院长吧。”本来田中隆吉对吴鹤龄的印象不很好，为什么又主动提出叫他当“政务院长”呢？大概因为吴鹤龄在日本三年期间经常和陆军省联系，并且学会了日文、日语，娶了日本女子作妾，对他的印象已经好转，叫他当“政务院长”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蒙疆”人民又加上一个得力的帮凶。吴鹤龄又去陆军省探问对于我们所提出的改组“政府”方案作何处理，回来报告我说：“武藤章对我说，德王提出这个方案，是因为他愿意专办蒙古事。既然他愿意这样做，给他在德化设立一个专办蒙事的机构，叫他干不好吗？”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后来有“兴蒙委员会”之设，或即种因于此。

我在“访问”期间，还以个人身份访问过吉田骑兵监。因为吉田在包头担任日本驻军部队长时，我曾去包头“慰问”军队，他特开一例，把日本部队集合起来，列队欢迎我讲话，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他和其他日本军人不同。当我访问他时，他除了殷勤接待外，并对我说：“我虽然离开了包头，但是对包头那里的事情，还时常打听，因此颇为熟悉。听说我走以后，继任我的中岛部队长做得很不好，逮捕了很多的人，并把为首的通敌

人员王文治等杀了。我认为他这个做法太拙、太笨了，捕杀这些人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利用他们的组织和人员，反转来为我们搜集情报，窥探敌情！不是更能知道许多消息，使我们的耳目更灵通吗？”我当时还很佩服他的“见解高明”，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做法不过是更为阴险，更加毒辣罢了。同时也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无论在做法上或软或硬，对蒙、汉人民都是不怀好心的。

我在日本“访问”游览一个多月，本拟在归途访“满”，只因东条英机要来“蒙疆”“视察”，就停止了中途访“满”，于当年3月16日返抵张家口。我返回后不久，东条英机就乘日机前来，我和他见面之后，没有谈到什么重要问题，他只是嘱咐我不要灰心，致力“东亚和平”和“蒙日亲善”工作。并说送给我步枪500枝，叫我组织卫队。他走后不久，又派富永中将前来，适我返旗未得见面。我回张家口后，“兴亚院”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转告我说：“富永叫我转告你，一切不要灰心，仍要努力工作。”大概不久，我即把曾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哈丹布和（暴德彰）从伪蒙古军调来，担任我的卫队队长，并从第七、八两师调来精壮的蒙古士兵，组成了卫队，用东条英机送给我的500枝步枪装备了卫队。

关于我的第三次访“满”。本来预定访日后即行访“满”，不意我偕同金井章二及随员等到达北平时，偶染重感冒病，不能坚持前往，中途折回，以致预定安排的访“满”通知没有及时传达经过的各地，使伪满在奉天（辽宁的沈阳）迎接的人员扑了空，伪满方面难免啧有烦言。这种情况，传到金井章二的耳朵里，又引起了对我的怀疑和不满。他曾向陶克陶等说：“德主席这次中途停止访满，使满洲国对蒙疆的印象不好。他是真正病重不能坚持前往呢，还是别有用意呢？据我看德主席一向主张吸收外蒙建

立大蒙古国，这次中途停止访满，可能不满意所订立的《日苏中立条约》吧？因为他认为在《日苏中立条约》中，日本默认了外蒙古独立。”实际上我没有这个意思，但也不便向他解释，只好听之任之。

1942年，适逢“满洲建国”十周年，我又偕同李守信等，作第三次访“满”，祝贺“满洲建国”十周年并感谢对“蒙疆”的援助。我等一行于这年4月21日到达“新京”（长春），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军政大臣于深澄，兴安局总裁札嘎尔及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等，均到车站欢迎。当我拜见“满洲国”皇帝溥仪时，他已不以臣属之礼相待，而以“蒙疆”“政权首脑”之礼，飨以国宴，隆重招待，在宴前致辞时，称我为“贵主席”了。我在访“满”期间，无非是参加庆祝典礼，访问各部大臣，游览名胜，没有什么重要活动。我访“满”回来不久，伪满洲国特派治安大臣于深澄为团长，兴安局参与官博彦满都为首席代表，带同随员十余名，到达张家口作“回访”了。

此外还有一些“对外”活动是：1. 1942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时，参加的有中国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的傀儡总统洛克菲勒，缅甸的傀儡总理八博莫士，“蒙疆”因为没有“建国”，仅以地区的名义派民政部长松津旺楚克为代表，偕同翻译札奇斯钦（于宝衡）前往参加。嗣日本召开“大东亚经济会议”，“蒙疆”派财政部长吉尔嘎朗前去参加。2. 约在1941年8月间，“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要来“蒙疆”访问，吴鹤龄对我说：“听说王揖唐最不愿意改称蒙古自治邦和使用成吉思汗年号，我们要做一个大大的蒙古自治邦政府牌子挂上，等他来时叫他看看，刺激刺激他。”王揖唐到达后，仅是“敦睦友邻”性质，应酬访问一天就返回北平了。嗣后朱深继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又

派苏体仁来访，亦系拉拢关系应酬性质，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可以记述。3.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驻外“常设机构”计有“驻日代表部”，过去概由日本人担任代表，仅和日本陆军省发生关系，日本外务省还不以外交机关看待。到了 1942 年，特派特克希卜彦为代表，经过交涉才由日本外务省取得“外交人员”证明书三份，确定由代表、参事官、秘书官三人使用，其他人员还不发给。每当日本外务省召集各国使节团开会，宣布有关外交重要事情时，不挂“蒙疆政府”旗帜，经特克希卜彦出面交涉才挂上。“驻日代表部”所办的经常事务是管理“蒙疆”留日学生和登记审核日本国内人蒙经营工商业的资本家。特克希卜彦秉承我的意旨，常到日本陆军省、外务省联络，探听消息，遇有机会就进行“蒙古独立建国”的活动。但是“驻日代表部”有日本警视厅特派的名为保护实则监视的警察人员时常进入，有关重要的消息，不敢用信件传递，只有托付妥靠人员捎来报告我。此外在伪满“新京”设有“蒙疆驻满代表部”，也算是“外交机关”。在华北设有“驻北平办事处”，是联络性质的机关。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称 “自治邦”与历次机构改革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经过几次行政机构改革和主要人事变动。主要原因是“蒙疆”地区既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各级伪政权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御用工具，每当日本驻军司令官或参谋长、最高顾问或总务厅长调动时，就有机构改革和人事调动。在历次“改革”机构中，有时也有我和吴鹤龄的意见，但须得到日本军部的承认，才能行得通，否则就遭到碰壁。下面记述几次较大的机构改革和主要人事变动：

伪政务院的变动与成立“蒙古自治邦”

1941年春，吴鹤龄从日本回来，我提出叫他当“政务院长”，但金井章二不愿意，就去鼓动高桥参谋长不要承诺。高桥和我说：“叫吴鹤龄当政务院长合适吗？”我说：“既然叫我当主席，我很需要他帮助，并且这是出于陆军省田中隆吉的意思，大概你也知道吧。”经我这样一说，高桥才无话可说了。金井章二见此计不售，就去策动卓特巴札普不要让出“政务院长”的位置。当我动员卓特巴札普把“政务院长”让给吴鹤龄时，无论如何劝说，卓也不愿放弃。并强调说：“在蒙古政府中，我是年纪最老的人，吴鹤龄是比我年轻的人，为什么要我把政务院长让他呢。”说了几个钟头也无效果，最后我不客气地对他说：“这个事情和日本方面都说好了，你也说过吴鹤龄能干，你如不让，就是阻碍贤路。”这样吴鹤龄便当了伪“政务院长”，把卓特巴札普调任为伪参议府议长。

吴鹤龄当上伪政务院长以后，就协助我进行“蒙古建国”工作。吴鹤龄既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主张“建国”要分成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蒙古政治邦”，第二步才是建立“蒙古国”。他在“蒙古军政府”时期，就草拟过“蒙古基本法”（似宪法）和“蒙古建国计划”。他在日本东京时，也秉承我的意旨，到处钻营活动“建国”，甚至不惜破坏祖国的统一，向日本朝野人士做过分割中国的建议。对于“蒙古建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也是做过研究，并且这样说过：“蒙古建国的国体问题，如仿照日本和‘满洲国’，应当采取君主国体或君主立宪政体，比较容易行得通。但如从远大目标说，我们不是还希望吸收外蒙建立大蒙古国吗？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目标，应当采取民主共和国体。”又说：“无论采取共和国体或君主国体，主席（指我）当国家元首是没有问题的。建立蒙古共和国你是终身

总统，如建立蒙古帝国，你是民选皇帝。”

关于“建国”的“年号”问题，我也再三考虑过。我认为最好是用“成德”二字。因为“成”是成吉思汗的成字，“德”是我名字的头一个字，合起来就是我“继承成吉思汗之德”。这与伪满皇帝溥仪登基后，应用康德年号表示“继承康熙之德”有同样的意义。我这个幻想和迷梦，简直狂妄已极，反动透顶了。

我们虽然做过这样的研究，吴鹤龄总认为一时不易实现，应当先把“蒙疆自治政府”改为“自治邦”，他就分向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和日本军部高桥参谋长活动。日本方面起初还不同意，至希特勒进攻苏联后，才允许对内改称“自治邦”，对外仍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吴鹤龄把接洽经过告诉我，我仍坚持建立“蒙古自治国”。吴鹤龄劝我说：“主席别再坚持了，建立蒙古自治邦问题，好容易遇到德国进攻苏联机会，得到高桥参谋长的承诺。设再延搁，深恐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反而又成了问题。”我再未说什么，表示默许，日本方面也再无异议。即于1941年8月4日挂上“蒙古自治邦”的牌子，算是宣布成立。既未举行典礼，也未展开宣传，一般仅知有“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而不知有“自治邦”，我深感不甚惬意。吴鹤龄解说：“蒙古建国问题事体重大，关系复杂，牵涉更多，必须逐渐实行，以求实现，第一步先成立蒙古自治邦，第二步再谋求建国。并且‘国’与‘邦’在汉文解释上虽有不同，但用蒙文翻译过来，都叫‘敖洛斯’，对蒙人也能说得过去。”他更进一步试探性地说：“蒙古建国不但主席一再坚持，力求实现，就是我也是梦寐以求的。如果蒙古一旦实现建国，主席登了大宝座，我这个政务院长，还不是总理大臣吗？”

最高顾问的调动

1942年元月，“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换成

大桥忠一。金井章二的调职，固然在日本人内部有其矛盾原因，但与我之反对他也有一定的关系。金井章二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知道日本在“蒙疆”实行反动统治，一时还找不到另一个适当的傀儡，仍有利用我的必要，因而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对于某些事情也很敷衍我。例如在汪精卫开始投日时，他曾和我说过：“蒙古建国之事，在汪精卫未建立政权之前，就应做成事实。”这话很合我的口味。我提议要在纯蒙地带建立一个新兴都市，作为“根据地”，他也表示同意，并到各处看过。但我总认为金井章二这个人，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特别是在制造“蒙疆”问题上，使我最伤脑筋，对他成见已深。因而在访日期间，就向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说他的坏话，表示对大桥忠一有好感，有意请他来当最高顾问。适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后，考虑到需要我调动蒙疆力量支援战争，就把我不愿意的人金井章二调走，把我欢迎的人大桥忠一派来充当最高顾问。大桥忠一到张家口后，没有先到日本军部请示机宜，而是先来见我。他的亲信人员提醒他，这样做会招致军部的不满。他却强调说：“我是德王特意聘请的最高顾问，当然要先拜德主席。”甚至连在张家口的日本神社，他都疏忽了，未去参拜，这更招致日本军部的反感。他上任之后，表示尊重我的“权力”，并对日系职员训话说：“你们把日本对蒙政策执行错了。在蒙古政府中，你们帮助蒙系人做事，不应对当地人藐视。”这样一来，在蒙疆政府当权的日本人，对他也心怀不满。同时他与驻在张家口的日本公使岩崎民男也发生矛盾。日本陆军省得知这种情况后，特派一个军官前来了解，听说也不赞同大桥的做法。这个人回去不久，陆军省就迫令大桥忠一回国。我听说以后，就去日本军部面见七田司令官表示挽留，七田坚决不肯，一定要撵大桥走。我见大桥后仍表示挽留他，并劝他暂时不要走。大桥对我

说：“主席不必为我一个人惹了军部和公使馆，我还是走吧。”当大桥走的时候，岩崎公使和日本军部参谋部等均未到车站送行，仅派一两个中下级军官到车站应付一下，大桥理也不理就登上火车走了。大桥走后，吴鹤龄对我说：“咱们老蒙古就是心实，总认为大桥忠一好，金井章二不好，一切信任大桥忠一。但是他来了之后，我们什么权力也未得到，还失掉了一些权力。例如蒙疆银行总裁，向由蒙古人担任，大桥来了之后，说由日本人担任吧，结果寺崎英雄当了总裁，特穆尔博罗特任为副总裁。另一方面我们要让蒙古人当总务厅长，可是没办到。当他来的时候，我还问他，你还亲任总务厅长吗？最高顾问是在政务院长之上的，总务厅长是在政务院长之下的，你如感觉兼任不合适，可以仍由蒙古人担任总务厅长。他立即答复我说‘我兼，我兼’。由此看来，他是不管制度上是否合适，有权力的就抓，一点也不放弃。据我看来，大桥走了也好。大桥这一走连最高顾问也带走了，有什么不好呢？”的确，日本军部是用高压手段控制我，大桥忠一这个日本政客是用笼络手段软化我，统治蒙古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蒙疆政府”的几次行政机构改革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特在“蒙疆联合政府”内设立一个“总力委员会”，由总务厅长武内哲夫任主任委员，由各部、局、会日系次长分任委员，下设一个“弘报局”，担负宣传动员支援战争之责。1942年6月1日，日寇为了实现“蒙汉分治”政策，便于从中驱使利用，又进行机构改革。这次改革的要点是：1. 撤销伪牧业总局，成立“兴蒙委员会”，专管盟旗属于蒙人的事务。2. 将伪民政部、伪治安部合并为伪内政部，专管政厅、盟、县、市属于汉人的事务。3. 特设“回教委员会”，专管拉拢回族和联络西北回族工作。4. 将伪产业、财政两部合并

为经济部，以便统一管理征用战略物资。5. 将伪司法部改称“司法委员会”，将伪交通部改为伪交通总局。随着行政机构的改革，主要首脑人员也有很大变动：调任民政部长松津旺楚克为“兴蒙委员会”委员长，调任吉尔嘎朗和察盟劝业厅长穆克登宝为副委员长，调任村谷彦治郎为主任顾问；原伪财政部长马永魁调任伪经济部长；原伪治安部长丁其昌调任伪内政部长；伪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早坂冬男调任内政部次长；原产业部长杜运宇调任伪司法委员会长官，伪司法部次长藤井五一郎仍任伪司法委员会次长；伪交通部长金永昌仍任伪交通总局局长；新任蒋辉若为“回教委员会”委员长，李郁周为副委员长；伪总务厅长关口保离职，暂由金井章二兼，嗣后又调来武内哲夫任伪总务厅厅长；武内哲夫离职，又由次长前岛升署理伪总务厅厅长；原伪司法部长陶克陶，原伪牧业总局长郭尔卓尔札布调任“参议”，伪产业部次长藤公平调任顾问。这次机构改革是高桥参谋长到任后主持进行的。关于伪司法部改称司法委员会，因未设一个委员，所以称司法长官。我实在感觉不合理，提出应当考虑。高桥参谋长说：“这次机构改革，谁都说好，我看就这样吧，不用改了。”对于“兴蒙委员会”的设立，汉人方面啧有烦言，认为“蒙古政府”内不应再有“兴蒙委员会”之设；既设有“兴蒙委员会”，就应有“兴汉委员会”，才算公平合理。

1943 年秋，又进行机构改革。因经济部所管业务特繁重，乃补充为经济、产业、财政三部，调任“晋北政府”长官田汝弼为经济部长，任吉尔嘎朗为财政部长，调杜运宇为产业部长，把原经济部长马永魁调任参议。调任“晋北政厅”民生厅长文画君为司法委员会长官，调任金永昌为最高检察厅长，特任穆克登宝为交通总署长。各部、会、局又配了次长，陈有声、陶克托胡（陶布新）为总务厅次长，恩和阿穆尔（张绍庭）为交通总局次

长，图木勒巴塔尔（刘定一）为产业部次长，超苦拔都尔为“兴蒙委员会”副委员长，张子荣为经济部次长，赛吉尔胡为内政部次长。同时把“察南政府”改成“宣化省”，由张家口迁至宣化办公，把“察南政府”原址做了我的“主席府”，调任“察南政府”长官陈玉铭为参议，原最高检察厅长刘继广调任为宣化省长。将“晋北政府”改称“大同省”，调任巴彦塔拉盟劝业厅长李树声为大同省长，将张家口市升格为“特别市”，归政务院直辖，任命崔景岚为市长。在张家口升格为“特别市”时，吴鹤龄认为张家口这个名称不好听，想改称“怡和浩特”特别市，用蒙文解释是“大都”的意思。而用日文翻译过来，“怡和”二字是很不体面的意思，日、蒙等人都说不好，因而未改。为了在行政上配合日本帝国主义西进的企图，特在包头设置“西部临时行政区”，将包头市、萨拉齐、安北、固阳三县划归“西部临时行政区”管辖，由伊盟盟长阿拉坦鄂其尔兼任该区长官，与伊盟公署合并办公。阿拉坦鄂其尔这个盟长，由仅管准格尔、达拉特二旗河北局部地区，一跃兼上管辖三县、一市的长官，从此有地盘、有收入、有警察队的武力了。巴彦塔拉盟盟长补英达赖，因失掉了包头市和萨拉齐县的管辖权，甚不满意。再把省、盟的官房、民政、畜产、警务各厅的编制一律改为总务、民政、实业、治安等处，并把厅下科的编制也改为股的编制，缩小了行政组织。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已确定张家口为“首都”。按一般常理说，也应把最高军事机构同时迁到“首都”，保持军事和政治的联系，但“蒙古军”总司令部仍在厚和。日本军部把“蒙疆”的军、政最高机构分开是别有用心：一者是“蒙古军”各师部署在包头、百灵庙一带，把总司令部设在厚和就便于指挥；另一方面，日本军部知道“蒙古军”是我的后盾，把最高军政机构分设两地，就减少我和带兵军官的接触，割断我和军队的

联系，不能依据政府组织法“主席”统率军队的规定过问军事。特别是自从我和李守信秘密勾结蒋介石事件败露后，对我和李守信更不放心。因此，让李守信常住张家口执行副“主席”的职务，把我和李守信当做军事、政治上的傀儡，便于日本人一手操纵“蒙古军”的指挥权。我为了把军事和政治联系起来，吴鹤龄也想伸手抓军事、行政权，想在伪政务院下设“军政部”或“军事部”，日本军部仅准设立一个“军事联络部”。结果就这样决定了，从“蒙古军”调来突布格日勒（乌云飞）中将为部长，下边配备几个校级和尉级军官，办理有关军事联络事宜。这等于“蒙古军”总司令部驻张家口的一个办事处，什么实际权力也没有，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军事机关。

“主席、副主席”的改选和调动

按照“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主席、副主席的产生都要经过推选程序。但在 1941 年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金井章二提出将夏恭副主席“依愿免官”，给予“前官礼遇”，调任为大同炭矿理事长。

迨至吴鹤龄当上伪政务院长后，看见夏恭“依愿免官”，“副主席”出缺未补，就想向掌握军事实力的李守信买好，就同我商量趁着这个机会，向日本人提出要求由蒙古人当“副主席”，我表示同意后，他就向金井章二提出这个意见。金井章二不客气地答复说：“你们要求蒙古人当副主席，要是晋北民众不向政府纳税怎么办呢？”吴鹤龄又向日本军部说，日本军部认为给李守信一个“副主席”的位置，便可常驻张家口，“蒙古军”司令部的日本人更便于工作。这样金井章二才表示同意。吴鹤龄为了符合“政府组织”法推选的规定，特向“察南”、“晋北”两个“政厅”要求拥护李守信为“副主席”的推选书，于是李守信便算合法当选为“副主席”了。吴鹤龄为了拉拢李守信，不仅为他奔走“副

主席”的位置，还把李守信的亲信旧部刘继广、李树声、崔景惠等安排在伪省、市长的位置。这些人经常在李守信的公馆进出，关系非常密切，引起我的秘书朝克巴达尔夫的怀疑，提醒我说：“近来吴院长和李副主席走得非常密切，不知在搞什么？我是很注意这个事情。”但我认为吴鹤龄和李守信接近，无非是互相互用，还不至于对我有不利行为，因此，并未介意。

按照“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主席任期三年”。我这个“主席”到了1942年8月底任期已满。因我认为仅由正副主席“互相推选”的形式，既不“体面”又不“隆重”，坚持应当召开第五次“蒙古代表大会”进行推选。日本方面大桥忠一也主张召开。于是这年8月31日在张家口召开第五次“蒙古代表大会”，推选我连任“主席”，于品卿、李守信为“副主席”。我发表了下面的就职讲话：“兹承蒙古大会推戴我为蒙古自治邦政府主席，深感责任重大，如临深渊。惟有不计功过，竭力奋勉，达成历次蒙古大会之使命，而符全体官民一致拥戴之殷情。大东亚战争系东亚解放之战争，我邦夙与大日本帝国及满洲帝国有密切不可分之关系，辐车相依，休戚与共，协力完成兴亚大业，为我全体官民应尽之义务。必须坚定信念，精诚团结，一心一德，努力迈进，以期邦基之安定。”

日寇通过“蒙疆政府”对蒙汉人民的血腥统治

“蒙古”、“察南”、“晋北”伪三政权合并后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如从年号、旗帜和组织上看，摒弃中华民国年号，应用成吉思汗纪元；不用中国的国旗，只制四色七条的政府旗帜；保有“政务院”和七部的编制，俨然是“独立”状态，脱离了中国的版图。但实际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均受日

本帝国主义的严格控制，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随着合并后的伪政权的建立，更进一步加深殖民地化。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蒙疆”各级政权对蒙、汉各族人民进行了血腥统治，哪里有半点独立的味道！

军事上镇压

日本帝国主义把“蒙疆”作为侵略中国西北的前哨，进攻苏联、外蒙的基地，特派一个兵团的兵力，分驻各地，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包头一带，准备伺机进犯西北；把一部分兵力分驻张家口、大同、厚和（呼和浩特市）及其他重要地点，用以镇压各族人民。在张家口设立“蒙疆派遣军司令部”，负责统一指挥，并在张家口、大同、厚和、包头、多伦、百灵庙、贝子庙、西苏尼特旗、西乌珠穆沁旗等地设置日本特务机关或日本宪兵队，搜罗地痞流氓充当特务。因而特务遍布城乡，打入机关团体学校中，监视人民的言论行动，刁难商旅，调戏妇女。当时“巴彦塔拉盟”副盟长墨尔根巴图尔曾和我说，有个日本人（忘其名）率领警察特务搜查户口，竟把几个妇女关在屋中，迫令脱去衣服，赤身裸体，供其玩耍作乐。我听见这个事情，曾请金井章二追查法办，当时金井章二也答应了。但过了几天，金井章二即对我说：“这个人已经应征入伍，无法追查了。”至于日本人带警察下乡，勒索、奸淫更是层出不穷，也从未听到受过什么处分。但在这一时期，曾发生日本军部逮捕据说是“违反纪律”的“蒙古军”第九师十几名士兵，处以枪决之事。该师师长包海明认为士兵不守纪律，应当归由本师处理，日军不应越俎代庖。当向“蒙古军”总司令部报告并请转向日本军部交涉，对越权处决该师士兵的部队长，给予应有处分，并且声言如不作公平处理，他就要带领该师士兵拉出去，激愤异常。经李守信转向日本军部交涉，高桥参谋长反说：杀了违反纪律的蒙古兵是应该的，对擅行杀戮的日本

部队长竟纵容不究。李守信处在日本军的压力之下，只有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这充分说明，在日寇统治下，日本人做出无法无天的事情，可以逍遥法外，所谓“违反纪律”的蒙兵，便要受到极刑。

1939年冬，傅作义军反攻包头，包头几乎失守。日本南支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来视察，岗部司令官和金井章二陪同到包头、厚和，我听到后也乘飞机赶到厚和和板垣会见。当时包头日本驻军小岛部队长，为了推卸防守有欠周密的责任，推说包头内部有“通敌分子”，泄露机密，这是“政府”所管警宪防查不周所致，不是战斗部队日本驻军的责任。金井章二是政府的最高顾问，面对岗部司令官也推卸责任说：“中国军队的反攻，正是日军调动之时，一定有人给敌人供给情报，李总司令（指李守信）可能知道，并且应负一定的责任。”李守信也不相让，说：“带兵官的调动，军队的换防，这是常事，并且都是秘密进行的，敌人何以知道？我听说，敌人反攻时，包头的商务会给敌军驮运烙饼做给养，内部也有‘通敌’人员给敌军送消息，这是政府所管警宪防守不周的责任，与蒙古军无关。”这样推来推去，结果反而是包头地方倒霉。在小岛部队长主持下，逮捕各界人士甚多，计有伪包头市公署职员王文治等。金井向我说：“在调查‘通敌’案件中，发现包头市长刘继广也有重大嫌疑，可能牵连在内。”我向金井说：“刘继广曾当过蒙古军第一师师长，在绥东战役和进占绥远出过力，就是他与是案有关，也应当顾念他过去的功劳，免于深究。并且他当过中将师长，军级很高，现在仍当包头市长，很不适当，应当设法调转职务，可否调他为最高检察厅长，请您考虑。”金井当时表示尊重我的意见。果然，不久，就发表刘继广为“最高检察厅长”。我为刘继广解脱，是从私人情感出发，希望他感恩图报，为我效力。至于其他被捕的爱国人

士，有的判处死刑，有的判处徒刑，饱尝铁窗风味，我就置若罔闻了。1940年春，在我通过军统勾结蒋介石案件中，刘长荣、吴君玉、杨金声被判处死刑，贺云章被非刑拷打死于狱中，梁芝祥、肖兆庚被判处徒刑，前已述及，兹不多赘。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案件中，日伪宪警逮捕教育界人士和学生多人，受非刑拷折磨而死者 100 余人，至日本投降，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得庆生还者仅 20 余人。对此案件我始终未曾过问。约在 1944 年，张家口日本宪兵队又将曾当过“蒙古军”第二师师长的尹宝山和陈生建逮捕下狱。这时因我勾结蒋介石案件败露，自知有短处，深恐招致日本人的疑忌，就连要求宽恕也未敢正面进行，只是暗地设法营救，结果由李守信花了六万多元，买通张家口日本宪兵队长，才把尹、陈二人释放。但尹宝山因遭非刑拷打，已成残废，在北平德国医院身死，陈生建也落了个孱弱的病体。还有百灵庙特务机关曾将乌盟茂明安旗札萨克奇默特色楞好若劳，以勾通外蒙的“罪名”逮捕，囚禁在特务机关内拷问取供。奇王被逼不过，自杀身死。以上几个案件，是我所知和所闻的事情，至于被日寇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残害的无辜人民就更多了。

日寇常以“确立治安”为名，抽调日本机动部队，配合“蒙古军”、警察队“扫荡”八路军，特设置重点于龙关、赤城、延庆和大青山一带山地，到处执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杀害人民，惨绝人寰。八路军为了保护人民，常和日伪军警展开游击战，打死打伤日伪军警很多，就是日本的将级军官和警监也被打死过几个。因为死一个日本将级军官，就得举行一次“慰灵祭”，迫令“蒙疆机关”、团体、学校的职工和市民参加。我这个“主席”或“政务院长”就得前往致祭。记得在 1944 年的一个时期内，日本张家口警备司令官某中将（忘其名）被八路

军打死，就以“光荣战死”的名义，举行过一次“慰灵祭”。因为连续举行“政务院葬”，“蒙疆政府”的礼堂，一个时期变成了葬礼场所。最使人可笑的是日本人弄虚作假，自欺欺人。当时日本军部有一个日本天皇裕仁的弟弟北白川宫殿下，在张家口清河桥侧观看空军演习，被一架飞机失事坠落砸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而日本军部却说北白川宫殿下以金枝玉叶之身，“转战蒙疆各地”，“光荣战死”就举行“慰灵祭”。驻在中国各地的日本派遣军的参谋长都来参加，并在张家口为北白川宫殿下建立纪念碑，迫令各界人民经过碑前，都要鞠躬默哀。各界人民在日寇淫威之下，只有绕路而过，表示消极抵抗。

日寇在“蒙疆”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均派有日本军警把守，对来往行人严加搜抢，无理非难。又时常调查户口，夤夜闯人民宅，持枪恫吓，任意搜翻。还强迫实行保甲连坐法，一人有事，全村不安。压迫人民最狠毒最凶恶的是日本宪兵队，假如被当成“国事犯”抓到宪兵队去，便受灌凉水、压滚杠、辣椒面熏、铁条烙、军犬咬、钉子钉穿脚骨等等非刑拷打。当时蒙汉人民称之为阎罗殿，无不畏之如虎。总之，当时蒙汉人民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淫威之下，真如日处愁云惨雾之中，人人提心吊胆，昼夜胆战心惊。

政治上控制

日寇在政治上所采取的策略，首先是找寻蒙汉败类，作为帮凶。其用人原则，对蒙旗是尽量拉拢封建王公阶级，如我和雄诺敦都布、松津旺楚克、郭尔卓尔札布、卓特巴札普、穆克登宝等，不是王公出身，就是旧时总管。对于地方蒙旗更是沿袭封建制度，任用封建王公担任盟长、札萨克职务。对于汉、回族尽量利用地主豪绅和工商业资本家等上层阶级，如于品卿、贺秉温、马永魁都是。资本家夏恭、田汝弼是晋北一带的地主豪绅，王英

是后套的恶霸地主。对于旧时官僚政客和军阀也是网罗利用，如吴鹤龄、李守信、蒋辉若等。至于留学日本的亲日分子，也给予高位，如杜运宇、陶克陶、吉尔嘎朗等。日本统治“蒙疆”将近十年，就是通过这一类人作为帮凶。其次是政治上分化。日寇在表面上标榜“民族协和”作为欺骗性的宣传，暗地使用挑拨离间伎俩：当着蒙古族人说汉族人不可靠，应由蒙古族人当权；当着汉族人说蒙古族人低能，应由汉族人执政。记得杜运宇就向我说过：“日本人对我说，如果不是我们日本人居中控制蒙古人，蒙古人对汉人的压迫统治更利害呀。”并把当地人划分为蒙系、汉系、回系、满系，分别对待和使用，以期在日本人操纵指使下，达到互相牵制，供其利用。其三是“日本人中心主义”。在各级政权及各会社公司中，日本人自成一个统治的系统，掌握一切权力。凡是重要事情和机密文件，都是由日本军部或“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通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最高顾问或伪总务厅长，由伪总务厅长通知各伪部局会长、各省、盟公署次长或参与官，各公司或会社的日系负责人，再由伪省、盟公署下达各旗、市、县日系参事官或顾问做秘密处理，不使当地人首脑知道。其中有的事情，需要当地首脑讲话时，给他做出文稿，让他当众宣读。所以各级伪政权、机关首脑，大都成了签名划行的傀儡，有时仅起传声筒的作用。就是特别接近日本方面的金永昌、陶克陶、杜运宇之流，也不能参加日本系统的会议。卓特巴札普身为伪政务院长兼察哈尔盟盟长多年，如果问他伪政务院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有时他到伪察哈尔盟公署去，还先给伪盟公署顾问送名片，说是我上班来了。结果博得日本顾问称赞，说：“达吉桑是（卓字日文译音）伟大。”

经济上搜刮

日本从经济上把“蒙疆”作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

本的殖民地。日本国内垄断资本家，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就地廉价采购原料，招雇低价人工，特在“蒙疆”设立株式会社或股份公司，直接操纵经济命脉。据当时日本出版的昭和 17 年度《北支蒙疆年鉴》记载，除京包铁路由华北铁道株式会社直接管理经营外，由“蒙疆政府”直接统辖的计有“蒙疆银行”、大同炭矿、龙烟铁矿、电业会社等株式会社九所，准特殊会社十所，普通会社 58 所，其中“蒙疆政府”出资占总数 31%，“蒙疆银行”出资占 10%，日本出资占总额 57%，现场工地出资占总数 2%。并且各会社的理事长或经理，绝大多数由日本人担任，其中虽有少数会社由蒙、汉族人担任理事长，也是由日系副理事长总揽大权。不但金融、电业、交通、煤矿、铁矿、畜牧等重要资源控制在日本人手，就是食品、石油、烟草、面粉、洋灰、砖瓦、木材、火柴等也都由日本人掌握。特别是由“蒙疆政府”公布“鸦片管理令”后，设立“清查总署”，组织“土药公司”等机构，公开收购、贩运鸦片，而鸦片组合和烟馆更是普设城乡各地，以搜刮和毒化人民。各伪县市公署还在城镇设立官营赌博场，美其名曰“俱乐部”，公然设赌抽头，聚敛民财，因之倾家荡产者不知凡几，投河上吊者也不乏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军费开支浩繁，日寇更巧立名目，增加税收，把这沉重的负担转嫁在沦陷区人民的身上：特公布“集谷管理令”和“家畜搬出取缔法”，强行粮谷“集荷”，垄断收购农牧产品，用极低的价格收购，残酷掠夺人民财富。而主管其事的伪官和奸商，从中压等压价，饱充私囊。大米、白面等细粮，拨归日军军用和日本人食用，当地人民只配给掺砂掺假、发霉的杂合面。还强行“棉布统制”，收购价格甚低，出售价格甚高，黑市价格更昂，广大劳动人民无力购买，以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牧业地区牲畜头数逐年下降，严重损害了牧民的生活。

文化上麻醉

日寇毒化蒙汉人民的思想、麻醉知识青年的手段，可以下列几方面说明：1. 实行奴化教育。以所谓“亲日防共”，“民族协和”，“发扬东亚道义精神”为教育方针，在学校中每日清晨举行“升旗典礼”，先向东方遥拜。经过日军岗哨，必须向“皇军”敬礼。通过日本“神社”，必须鞠躬致敬。每逢日本“天长节”等节日到来，各机关、团体、学校必须放假，悬挂日本国旗，举行“纪念仪式”。为了实行“工业日本、农牧业蒙疆”的侵略政策，仅准设立农牧业中等学校，禁止设立工业中等学校。2. 实行分化和同化教育。在中小学课程设置上，日文每周占七至十小时，而汉文或蒙文仅占三至五小时。专收蒙族学生的学校，限于学习日文和蒙文，不学习汉文。当时有的蒙古族人主张应学汉文，日本人说：“汉人文化不如日本文化高，与其学汉文不如学日文吸收现代知识快。”另一方面在专收汉族学生的学校，限于学习日文和汉文，不准学习蒙文。更尽量设置日语补习学校、日语进修班等来普及日语，就是想用普及日语的方法，达到同化蒙、汉、回各族人民的目的。用限制学习蒙文或汉文的方法，阻止蒙、汉、回各族人民自然融合。3. 在张家口设立“蒙疆学院”，在伪省、盟所在地设立“官吏养成所”或“训练班”等，对现职官吏从政治上灌输奴化思想。为加强亲日教育，并组织“蒙疆兴亚协进会”、“蒙古兴亚协力会”、“蒙疆青年兴亚同盟”等团体，笼络各界人士，麻醉各族青年。更在城乡广泛组织“劳动奉公队”，强迫人民负担修公路、修工事等沉重的义务劳动。4. 利用喇嘛教、佛教、道教、天主教、耶稣教、回教、红十字会、青帮、一贯道、纯一善社等宗教团体和反动会道门，麻醉人民思想，进行特务活动。5. 设立弘报局、放送局，发行“蒙疆新闻”、“蒙疆新报”、“蒙疆通讯”等报章杂志等，经常组织电影宣传班，深入

农村牧区巡回上演，大肆进行“亲日防苏、蒙日亲善”等反动宣传。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更尽量宣传所谓“建立东亚共荣圈”、“建立东亚新秩序”等，企图从人种、肤色、地域上来麻醉和欺骗人民，从而支援日本，反对美、英。

以上是日寇通过“蒙疆”各级伪政权对蒙、汉人民的血腥统治。我是“蒙疆政府主席”，当然是不能辞其咎的。

我对于日本强加于蒙、汉人民的统治，做了很多的帮凶事情。择其要者，有如下列各端：

调动人力，支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蒙疆自治邦”政府，为了动员全部人民支援战争，特由伪政务院长吴鹤龄起草，以我这个“主席”的名义，于1942年1月19日颁发“兴亚教书”如次：“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六年十二月八日，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对美、英颁发宣战大诏。鉴于本邦与日本帝国有特殊密切关系，应一致努力，誓共休戚。况大东亚战争之开始，乃大东亚解放之天机，本邦为大东亚共荣圈之一翼，须尽共同奋斗之责任。凡我邦官民应愈加巩固团结，发挥总力，内竭奉公之诚，外尽协力之义，迅速完成兴亚大业，是所至望。”随着这个“兴亚教书”的颁布，就借口“确立治安”，加强“剿共”，从而搜刮战略物资。由于战争范围的扩大和战争局势的紧张，对蒙、汉人民的压榨，就愈益残酷。

过了一年，为了响应汪精卫政府参战（对美、英），仍由吴鹤龄起草，以我这个“主席”的名义，于1943年1月19日，颁发第二次“教书”如次：“维我盟邦大日本帝国，为求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以期东亚各民族、各国家共存共荣，业于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对美、英宣战。本邦与大日本帝国夙有特殊密切之关系，为大东亚共荣圈之一翼。曾于成吉思汗纪

元七百三十七年一月十七日颁发‘兴亚教书’，以期一致协力此次战争，与盟邦大日本帝国，誓共休戚。现在开战一年，大日本帝国业经取得赫赫之战果，美、英侵略东亚之势力殆将净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指汪伪政府）亦于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八年一月九日，布告对美、英两国宣战，披沥同生共死之诚，誓协力大日本帝国，由此大东亚战力更进一层强化，增添战争前途之光芒。我邦官民必须遵照兴亚教书之主旨，发挥总力，继续奋斗，各尽其责，确立治安，增强生产，以期本邦之隆昌。更应全力以赴，赞助盟邦，协力战争，排除万难，歼灭东亚之公敌，确立东亚共荣圈，是所至望。”因此，又开展以“确立治安，增加生产”为中心的罪恶活动，使各级伪政权机关整备警察队，编练“靖乡青年队”，加强乡镇街村伪基层组织，实行“保甲连坐法”，进行“剿共”。更加强化粮谷“集荷”，强迫“劳动奉仕”，并由“蒙古兴亚协力会”开展献机、献铜、献铁运动，支援日军作战。

坚决防共

我在防共方面，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例如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就把“防共”定为基本方针，“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又把“防共”定为施政纲领，当众讲话时，更强调蒙古地区“防共”的特殊性。当“蒙古军”配合日本“剿共”时，我总是谆谆嘱咐带兵官努力完成“剿共”任务。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失利时，我为了巩固反动统治，谋求将来的出路，竟依照蒋介石对我“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扩编军队，组织武装，准备向八路军争夺胜利果实。

进行民族分裂

我总认为“蒙疆”原来是蒙古地方，蒙古人是这个地方的主人，把汉、回人民当作异族看待，蒙族应在其他各族之上。因

此，在“联盟政府”时期，凡属伪政府处长以上的官员，都不肯任用汉族人，选送留日学生一律限于蒙古族人。“联合政府”时期，选送留日学生蒙、汉、回族人数虽然有一定比例，但蒙古族人仍居多数。我曾想把铁道以南的蒙古族人移至铁道以北，把铁道以北的汉族人移至铁道以南，来一个蒙、汉大搬家。“兴蒙委员会”开会时，我又策动亢仁提出我这个意见，并把土默特旗青年分期分批移到纯蒙旗地带，学习蒙文蒙语，免受汉族“同化”。亢仁等认为这样做，很易惹起麻烦，没有按照我的意图提出建议而作罢。在“蒙疆联合政府”时期，察盟参与官筒牛耕三郎主持实行旗、县划界，我极力赞成，有的主管人不愿把蒙旗地方划归邻县，我曾力劝他们忍痛割爱，要为“长远”打算，现在宁肯失掉一些地方，可以从此割断汉民的移入，保持蒙旗地带的“纯洁性”。结果这次旗、县划界实行了。由此可见，促使蒙、汉分家，防止民族交流，我是有过于日寇而无不及。

维护封建制度

日本在东北制造伪满洲国以后，特颁布“旗制实行令”，将札萨克制度改为旗长制度，把王公世袭政权逐渐转为地主阶级政权。但在“蒙疆”的做法，却是极力维护封建制度。1940年8月29日至30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召集各盟旗的盟长、副盟长、札萨克、总管等在张家口举行“蒙古会议”时，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在讲话中宣布：“蒙疆特殊区域的社会构成，是纯蒙地带，蒙旗制度，社会制度和历史沿革。因此，维护社会构成的阶级制度，是尊重现行札萨克旗制的存续。”

日本维护封建制度的措施，当然我是同意的。为了延续封建制度，还发表了“宣言”和“纲领”。

“宣言”原文是：“我们祖先奄有欧亚版图，创立君临世界之大帝国，有光辉之历史。惟自元以后，势力衰微，不如往昔，然

仍坚持蒙古民族之传统。近 20 年来，更受边吏军阀百般之压制，缅怀太祖，自觉赧颜，不敢再事因循苟安。云王等各位先进，曾在百灵庙发起自治，但议民族复兴，复在友邦大日本协力之下，举‘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之大旗，作复兴蒙古之前驱。我等应继承其衣钵，内则同心和爱，外则敦睦邦交，是我等自觉之使命。进而发展生产，增殖人口，振兴教育，致力厚生事业，拥护政府主席，建立东亚新秩序，发扬东亚道义精神，太祖有灵，当护佑之。”

“纲领”的序文如次：

“我等缅怀太祖之伟业及发扬其传统精神，谋求民族之复兴。我等巩固团结与友邦提携，以强化‘防共’战线。③我等力求吸收世界知识，促进文化之发展向上。④我等勤俭自持，励精图治，促进生产之兴隆。我等力求厚生事业之发展，以期民族之繁荣。”

东乌珠穆沁旗札萨克多尔吉横征暴敛，压迫旗民，引起旗民之反对，下令将其免职。但惟恐动摇封建制度，仍令他的很小的儿子继任札萨克，叫多布丹暂时护理札萨克职务。乌盟乌拉特中旗札萨克林庆僧格当了盟长，呈请准由他的儿子雄诺继承札萨克职务。其子年龄尚幼，不合惯例，“兴蒙委员长”吉而成郎向我请示处理办法，朝克巴达尔夫趁机向我建议说：“蒙旗王公世袭的封建制度，应当逐步改革，现在应当把王公爵位和札萨克分开，实行袭爵不袭职。”我婉言拒绝了。吴鹤龄也坚持沿袭旧的封建制度，不应骤然变更，因而林沁僧格的呈请亦被批准了。由于日本当权者宣布尊重蒙旗的封建制度，不仅札萨克旗制一直没有变，还想把察哈尔有的总管也改为世袭。例如卓特巴札普因为自己当伪政务院长兼察盟盟长，呈请准叫他的年龄幼小的儿子任为明安旗总管。我起初还表示不肯，深恐引起该旗人士和青年人

的不满，但经不起卓特爾巴札普一再請求，並為了敷衍他的面子及調和我們二人之間的矛盾，也就默認了。但青年職員嘖有煩言，因而又以不到年齡為理由，准許他的兒子為記名總管。

我雖忠於日寇，只因在某些問題上有過意見，反招致日本軍部和“公使館”的不滿。記得在召開第五次“蒙古大會”推選主席時，中島萬藏向我透露消息說：“岩崎公使曾對我說過，德王這個人老是不聽話，總是嗷嗷不休，換另一個人代替他為主席不行嗎？”日本軍部政治參謀大橋雄熊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典型，有時就把本來的猙獰面目暴露出來。有一次，在“遠來莊”飯店請他便宴，在談話中涉及有關蒙古的事情，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不意他却以很不耐煩的樣子說：“你老是蒙古蒙古的，蒙古干脆滅亡就得了。”我的秘書胡克金太知道這話不是滋味，不敢翻譯給我聽。我因與日本人時常接觸，也能听懂一些簡單的日語，知道他所说的意思，但我這時却有了“涵養”，裝作不知。

支持吳鶴齡與“蒙疆”垮台前夕的掙扎

我支持吳鶴齡當上偽政務院長以後，曾做了下列幾件事情：
設立“蒙疆豪利希亞”

日本既從軍事上、政治上控制“蒙疆”，又從經濟上成立“大蒙公司”和“蒙疆畜產公司”，收購牲畜皮毛，運售日用物資，從中獲取高額利潤。吳鶴齡為了抓經濟權，特把原有的“蒙古生計會”加以整頓，仍由他兼任會長，聘請中島萬藏為顧問，在蒙古生計會之下，設立“豪利希亞部”，在各旗一律組織“豪利希亞”，經營收購牲畜皮毛並運銷日用百貨業務。這事着手進行以後，察盟參與官簡中耕三郎為了維護日商的利益，特提出反對意見說：“蒙古王公們現在組織豪利希亞，是想從中獲利當資

本家。”我和吴鹤龄听到这话以后，便规定蒙民每人入股至少 10 元，至多 3000 元，来抵制日本人的反对。“豪利希亚”设立以后，吴鹤龄究竟从中赚了多少钱，我无从知其底细。他的亲信人员罗励甫可是发了大财。听说在北京就买了多处房产，并设立聚义银号。吴鹤龄对罗励甫不仅未加责斥，反尽力庇护和代为遮掩，时常夸说罗励甫如何能干，能办到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因为我支持吴鹤龄，曾引起日本军部的怀疑，冈村参谋就曾问过陶克陶：“德王很支持吴鹤龄，是否他们二人有经济关系。”陶克陶答复说：“德王支持吴鹤龄是政治关系，还不至于有经济关系。”这话是陶克陶向我说的。

设立“蒙古留日预备学校”

我支持吴鹤龄设立这个学校的目的，是想培养忠于我们的人才，取得蒙古族知识青年的拥护。先组织一个“蒙古留日学生后援会”，由松津旺楚克为会长，继而设立“蒙古留日预备学校”，由吴鹤龄兼任校长，莎音托布任主事，主持招收蒙古族青年，着重学习日本语文，补习一个时期后，便送往日本留学。这个学校确定是民办官助性质，资金来源大部分是“蒙疆政府”补助，少部分是私人捐献。我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划拨尚未花用的“蒙人教育复兴费”五万元拨作该校基金。这时恰巧日本军部给我五万元，也悉数拨作该校基金。我将此款拨交吴鹤龄后，还向金井章二说明此事，金井说：“这是军部给你的钱，你怎么处理都可以。”同时，这个学校计划在十年期间，筹集基金 1000 万元，保送蒙古族留日学生 1000 名。我认为计划送这么多的留学生到日本去，是促进“蒙日亲善”的具体表现，必然得到日本方面的好感。不意金井听到以后说：“用这些钱，送这么多留学生到日本去，是给日本增加负担，对日本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在日本的留学生多是抗日的。”

制定“蒙旗十年建设计划”

这个计划是吴鹤龄起草的，预定分期分批建设“蒙古新村”，其中的中心新村预定设在旗公署所在地。中心新村内政治上有旗公署，经济上有豪利希亚，文化上有中心小学，军事上有保安队，形成每个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并于 1943 年组织三个“蒙旗建设队”，分在锡盟苏尼特右旗、察盟镶黄旗、乌盟的四子王旗开始建设。所有建设资金悉由“兴蒙委员会”支給，不叫所在蒙旗负担。我是尽力支持这个工作的。因为我和吴鹤龄及部分蒙古中上层职员，认为蒙旗是我们的政治资本和根据地。并且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已走下坡路，一旦失败，我们在蒙旗建设一些据点，好作东山再起的根据地，继续统治蒙古人民。

吴鹤龄虽然费尽心机，培植个人势力，拉拢晋北人士（如田汝弼、文画君等）和察盟总管（如穆克登宝、包楞那木济勒、阿由尔札布等），想着巩固伪政务院长地位，但其为人度量狭小，骄傲自大，排除异己，特别是利用罗励甫等亲信，经营“蒙古生计会”和“豪利希亚”，从中赚钱肥己，更招致非议。被其打下擂台的陶克陶，调到伪司法部清水衙门的金永昌，前伪政务院长卓特巴札普等，对他素即不满，便趁机起而攻击。补英达赖认为自己已是蒙古“元老”，企图争取伪政务院长的地位。杜运宇为“亲仁会”^① 首领，察南一带颇有势力，因调动职务关系，对吴鹤龄已有不满。吴鹤龄的妹夫乌古廷，时任“蒙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依仗吴的势力，把持军权，又使李守信与吴亦不无芥蒂。于是这几个人便联合起来攻击吴鹤龄，揭露“蒙古生计会”和“豪利希亚”的黑幕，由陶克陶出面向日本军部冈村政治参谋告密。冈村对于吴鹤龄把持政权和乌古廷把持军权的所作所为早

① 亲仁会——日本授意杜运宇组织的亲日团体。

已不满。恰在这时，乌古廷和其四弟乌臻瑞（伪第七师参谋长）在德化一带私购大批鸦片，乘坐汽车前来张家口，被日本宪兵队扣获。冈村得到这个把柄，便来向我告知。我认为既然冈村参谋长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就转向吴鹤龄商量说：“乌古廷这个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现在又出了私运鸦片的事情，就得撤换他的参谋长。”吴也同意，经我俩研究结果，认为包海明向与潘井顾问关系密切，不会得到李守信的同意，便决定叫宝贵廷继任参谋长。吴鹤龄失掉了掌握军权的乌古廷的支持，陶克陶等便群起攻击，更成了众矢之的。冈村参谋还采用陶克陶的建议，特把补英达赖找到军部，面许叫他当伪政务院长，用这个方法来抵制我支持吴鹤龄。补英达赖这时升官心切，既然得到冈村参谋的默许，就来见我说：“这回吴鹤龄下台，政务院长该轮到我了。”我只有默不作答。嗣后我又到日本军部与中川参谋长和冈村参谋商量伪政务院长之事。他们表示要我亲上第一线，主持“政务”。于是吴鹤龄便在各方攻击和日本军部胁迫之下；离开伪政务院长职务，由我兼伪政务院长。我为了维护吴鹤龄颜面，满足补英达赖的政治欲望，特在伪政务院之下，各伪部会局之上设置内务、军事、经济、司法四个长官，由吴鹤龄任内务长官，负责指导兴蒙委员会、内政部、回教委员会的事务；由副主席于品卿兼任经济长官，负责指导经济、财政、产业、交通各部局的事务；由副主席李守信兼任军事长官，负责指导军事、保安等事务；由补英达赖任司法长官，负责指导司法委员会、各级法院及检察厅事务。吴鹤龄因此却一气去了北平。补英达赖颇为满意，向人表示说：“我现在总算和两位副主席平行了。”这一场互相倾轧、互相排挤、争权夺利的内部纠纷，才算结束。

我在未兼伪政务院长以前，日本人麻生达男（蒙名麦德尔札布）、猪口和玛尼巴达拉等从伪满洲国来张家口，募集在王爷庙

建筑成吉思汗庙经费，我在官邸宴请他们。宴后麦、猪两个日本人走了，我和玛尼巴达拉、朝克巴达尔夫等密谈关于日本失败后怎样谋求出路的问题。我们认为，日本失败后，国民党的军队必然反攻过来。趁着这个机会，东、西蒙要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出路。至于集中地点，认为王爷庙偏东，张家口偏西，约定以林西、林东、经棚一带为集中地点。日本一失败，我们就把东西蒙的军队力量集中到这一带，组织建立一个“蒙古自治国”。

我兼伪政务院长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上着着失利，德国在欧洲战场上也是节节败退，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谁负问题已见分晓。我便依照和玛尼巴达拉的约定，组织力量，企图做最后的挣扎，谋求将来的出路。

组织武装力量

我一向是迷信武力的，便从下列几方面组织武装力量：一是把“蒙古军”以蒙族人编成的第七、八、九各师及直辖骑兵队、炮兵队，加以整备充实，作为基本力量。二是把从“蒙古军”划出、改编为各盟、省伪靖安警备队的一、二、三师归还原建制，并将各市、县的伪警备队改编成十六个旅，作为机动力量。三是把各盟旗所属的保安队，改编为五个警卫师，由盟长兼任师长，作为盟旗地方的防卫力量。我这个计划，因涉及伪内政部警察管理权，招致内政部次长早坂冬男的反对。嗣经与日本军部几次交涉，才得到中川参谋长的同意。早坂冬男才无话可说了。并为了统一指挥，在伪政务院之下设立“军事部”，由李守信兼任部长，由崔玉堃和郭勒敏色为次长。这时我有计划地把武装力量组织起来，有两个企图：一是把隶属不同、力量分散的武装集中起来，掌握在我的手里，阻击八路军；二是把分散的武装力量组织起来，易于灵活调动到林西、经棚一带，作为东、西蒙古联合起来建立“蒙古自治国”的支柱。

设立“行政统监部”

为了把伪政府的文职人员集中在纯蒙地带，备作日本失败后另谋出路为我驱使，特在察哈尔盟明安旗设立“行政统监部”。并派出一部分蒙古族职员，着手勘察地址，准备房屋，运送物资，备作第一步退守的根据地，第二步再向林西、经棚一带集中。

处理日伪军警残杀丰镇县九宫道徒事件

1943年9月间，伪丰镇县警察署派员下乡，催缴公粮、逼要烟土，迫令连夜送缴，无力缴纳者都被严刑拷打。九宫道的道士李伍仁等起而抗辩，也被殴打，因此激起全村民愤，聚众1000余人，手持斧头镰刀，群起暴动，打死胡姓翻译一人，打跑了警察队，缴枪十余枝。丰镇县又调派伪军警300余人，将暴动的民众包围，开枪射击，结果打死打伤的民众甚多，焚烧民房数间。这次残酷的镇压，民怨沸腾，我兼理伪政务院长后，认为这是收买人心的最好机会，便提出将伪丰镇县伪县长、日系参事官、警察队长惩戒免官，以平民愤。内政部次长早坂冬男还不同意，我是坚持非办不可。这时我因有事回旗，暂由李守信代理伪政务院长，临行前对李守信说：“假如对丰镇县长、参事官、警察队长不实行免职，我就不回来了。”这时日本人由于太平洋战争失利，对我的控制比前松些，早坂冬男也就再不坚持了，结果是按我的意见实行。伪警察队长安恩达被免官后，特到张家口见我诉说委屈。我认为他是李守信的旧部且今后尚有需用之处，便安慰他说：“你的委屈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你主持干的，而是日本人主持干的，但你是参与人之一，不得不把你免官。希你善体我意，暂时忍耐，今后遇有机会还会重用你。”我当面又给他蒙疆伪币一万元。这是我用明惩暗奖的两面手法，阳则示好被害民众，阴则奖励杀人罪犯，希望今后更好为我效忠。

召开县长、绅士会议

我知道日寇强行的粮谷“集荷”是最不得人心的事情，因此，召开县长、绅士会议，提出整顿粮谷“集荷”问题。我讲话说：“自从实行粮谷‘集荷’以后，把民众血汗换来的粮谷‘集荷’起来以后，不加妥善保管，任令人马践踏、风吹雨打，以致霉烂损失，实在对不起民众。”我说这话的目的，是希望取得与会士绅的同情，并且通过他们为我宣传，博得当地民众的称赞，意图日本失败后，不至于反对我。我讲话之后，与会绅士多表赞同。嗣又谈到处理丰镇县九宫道事件问题，表示惩罚失职官吏，对死伤民众甚为痛心。集宁县绅士张某（系张书常之父）说：“丰镇县九宫道不幸事件的发生，德主席非常痛心。我建议在建事地点建碑一座，上书‘罪在吾身’四字，这是主席下罪己诏的意思，用以纪念这次不幸的事件。”当时对他这个恭维性的建议，我很感舒服，对他极口称赞，他也自鸣得意。但是参与会议的伪内政部长早坂冬男，听到我的讲话之后，甚为不满，向伪内政部长丁其昌说：“德主席在绅士会议讲话时，有反对粮谷‘集荷’的意思，是不愿再对大东亚战争协力吧。”虽然他这样疑忌和不满，但还未正式提出反对而惹起大的麻烦。

我正在积极准备退守之际，太平洋战局日趋紧张，联合国军连续轰炸日本本土，欧洲战局更是急转直下，苏联红军很快地解放了柏林。接着就出兵东北，打垮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帮助中国解放了东北人民。日本天皇裕仁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苏队蒙军队很快进至锡、察两盟，张北县城，八路军也迫近张家口周围。这时李守信正在张家口，给宝贵廷拍发急电，叫把“蒙古军”各师调至张家口和阳高县一带。因为铁路已被八路军切断，调动军队确有困难，同时宝贵廷为谋个人出路，打算投靠傅作义，也不愿执行我和李守信调遣军队的命令。驻在

锡、察盟的“蒙古军”已被苏蒙联军缴械，张家口仅有少数伪警察队，日本军部对我表示他们业已奉命投降，希望我们自找出路，并由中岛万藏前来向我和李守信等说：“谁如愿去日本避难，日本军部可以为之准备飞机。”嗣由李守信向张家口渡边警备司令官询问可否去日本？他答说：“不行！我们日本已是战败国，对战胜国就得无条件服从。人家如果向我们要人，我国就得交出来。”这时在张家口的各伪机关蒙族职员，纷集我的官邸，有的主张南下投靠国民党政府，有的主张北上投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的主张就地等待八路军解放，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我这时也是徘徊不定，经与一部分蒙族职员商量，决定分向各方面谋求出路。当前最好先派代表向苏蒙联军试探接洽，结果就派定亢仁、朝克巴达尔夫、特木耳都克什为代表前往接洽。但因一时仓促，既未带证明文件，也没有俄语翻译，就连把在押的外蒙政治犯放出来充当俄语翻译和联络人这个事情都未想起来。同时也认为以“蒙疆政府”名义发给证明文件，苏蒙联军是否接受也是问题。亢仁等三人就仓促乘上汽车，和日本军部联络通过军事前线，前往张北与苏蒙联军进行联络。后来听亢仁说，他们到了张北就被当成俘虏拘留起来。原因是他们虽然见到了苏军上校瓦斯列克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少将色恩道并说明来意，但斯、色却表示说：“你们过去既与苏蒙没有联系，现在又无具体表现，更未带证明文件说明你们的代表身份，日本虽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前方军队仍在对峙，这简直是把关于国际交涉的事情当成儿戏，无法承认你们是代表，只有把你们当作俘虏对待，暂时拘留起来。”从此，即与我失去通讯联络。适在此时，苏蒙联军的飞机飞临张家口上空，散发传单，痛骂我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官吏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我认为联络苏蒙这条路已属无望，又不愿迎接八路军解放张家口，只有走投靠蒋介石这

条路。恰在这时军统特务王野人、梁芝祥和国民党绥蒙党部特派员于福赓、杨润霖等前来张家口，拉拢我和李守信等投靠国民党，并由王野人给我和李守信送来军统局的电报，内容大意是：“兹经请准派德王为蒙旗先遣军总司令，李守信为热察先遣军总司令。希即重整军队，严防共军，如果武器不足，应即收缴日军武器，装备军队。台端训练军民，忍辱负重有年，现在为党国效忠，正是其时，务要保卫绥察蒙旗地方，勿使共军得逞。”这时吴鹤龄也由北平返张，劝我不要和外蒙联络，应即赴平设法与蒋介石接洽。我也认为我曾和蒋介石有过联系，可能得到他的谅解，因此就决定先去北平。并由超苦拔都尔拟具电报，电请蒋介石派来飞机，以便前往重庆，交由王野人派人送到北平拍发。日本人知道我要走，为了“酬劳”，特由中岛万藏给我送来几车大烟板子，共 15 万两，让我分一部分给职员，一部分归我花用。我因为野心未死，仍想东山再起，深恐临行时拿上几车大烟土，落一个贩卖大烟土客的名声，对于我的政治前途有影响，并怕分赃不均引起争吵的麻烦，就拒绝未收。但临行时却带了蒙疆伪币三亿元、银洋三万元，到北平后，除分给大家外，给我买了一处住宅。至于三万银元，中岛万藏移交我花用，我听了中岛的建议，恐怕银元贬值，换成法币。结果法币贬值更大，很快就花完了。

我既然决定南下投蒋，于 9 月 19 日派人通知伪中上级蒙族职员连夜在车站集合，我和李守信即率同到站职员，乘上备好的专车赴平。

在日寇统治下，成立了六年之久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随着日寇的失败而瓦解了。

说明：

1.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统辖地区是：锡林郭勒盟，乌

兰察布盟全境，察哈尔盟的部分地区和伊克昭盟黄河以北部分地区。首府设在绥远省会归绥市——即今呼和浩特市。

2. 伪察南自治政府统辖地区是现在河北省蔚县、宣化周围各县和张家口市，首府设在张家口市。

3. 伪晋北自治政府统辖地区基本上是现山西省大同专区所属各县，首府设在大同市。

（德穆楚克栋鲁普，曾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